

第一章

农业革命和古代文明的诞生

- 人类文明不是四大文明，而是五大、六大、七大甚至八大文明
- 没有农业革命就不会有人类文明
- 农业是一切古代文明社会的经济基础和物质基础

一、人类文明发展的基础

在历史科学中，文明和文化是两个有密切联系又有严格区别的概念。就其密切联系说，文化与文明在一般场合可以等同使用，我们既可以说中国文化，也可以说中国文明，或文艺复兴文化、文艺复兴文明等等，人们并不觉得这样说什么毛病。但就其严格区别说，则文化是一个更为广泛的概念，它们可指人类从古到今一切社会劳动和精神创造的成果；而文明只是指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以后，有了国家、有了文字的各阶段的文化成果。就这个意义说，原始社会的人类有文化，却还没有创建文明，我们可以说原始社会的文化，却不宜说原始社会的文明。人类的文明是在原始社会瓦解以后才发展起来。最早诞生文明的地区，就是我们通常所谓的“文明的摇篮”；过去认为中国、埃及、两河流域（巴比伦）、印度这四大文明古国就是人类文明的摇篮。但近年的考古发现和历史研究却告诉我们并不仅仅限于这个数目，欧洲和美洲也有自己的古代文明诞生地，因此不是四大文明古国，而是五大、六大、七大甚至八大（加欧洲是五、再加美洲是六，如果认为美洲有两个甚至三个古文明诞生地，则是七与八）。由此也可以说，文明的曙光是繁花似锦般地在世界各地闪耀的，日后的考古新发现说不定还会为我们找到更多的古代文明的摇篮呢！

文明的诞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在原始社会后期，生产力有了较明显的提高，从旧石器时代进入新石器

时代，从狩猎采集经济转向农业畜牧经济，现在我们把这一总过程称为农业革命。有了农业，人类社会的下一步发展就是建立国家，创造文明，因此可以说它是人类历史上影响最为深远的革命。近年来国际学术界有人类社会三次浪潮的说法，就是以农业革命作为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浪潮，工业革命是第二次浪潮，我们今天面临的信息革命则是第三次浪潮。这样说虽然简单，却生动地表明了农业革命的重要意义，而农业和畜牧业的产生也就奠定人类文明发展的基础。

农业革命最早是在哪些地区发生的呢？据近几十年的考古发现，已可初步肯定就世界范围而言，最早发生农业革命的是西亚地区，就是今天伊朗、伊拉克、叙利亚、土耳其和巴勒斯坦、以色列一带，尤其是从伊朗西部到巴勒斯坦的弧形地带或新月形地带。这儿地处亚、欧、非三大洲连接处，从几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末期起就是远古民族流动接触较多，信息交换频繁的地区，它的气候、土质、动植物资源等自然条件也有利于农业和畜牧业的萌生。农业革命以后，这一带也是最早产生古代文明的地区——以两河流域为中心的西亚各文明地区。因此它的考古发掘工作的开展在世界上也是数一数二的，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对这个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的发掘和研究比较充分，已知重要遗址数以百计，对有关农业、畜牧业的发生从萌芽到成熟过程也了解得比较清楚。大致而言，从公元前 10000 到前 6000 年间，这一地区已经历了原始新石器和早期新石器两个阶段，前者是农牧业的萌芽时期，后者则出现了较成熟的农业村落。若以年代分，则前一阶段约在公元前 10000 至

8500 年间,后阶段约在公元前 8500 至 6000 年间,无论从萌芽到成熟,这儿的发展都走在世界其他地区之前。

在叙利亚、巴勒斯坦、黎巴嫩、以色列一带的原始新石器文化名叫纳吐夫文化(以最早发现的遗址命名,纳吐夫在今巴勒斯坦),近年在这些地区发现的纳吐夫文化遗址相当多,其中较发达的如以色列的马拉哈,已是一雏形的农村。此外,西亚原始新文化比较集中的另一地区是伊拉克北部和伊朗西北部一带,其中最重要的遗址是伊拉克的扎维凯米——沙尼达尔。这些地区的许多原始新石器文化遗址都显示了长期居住的迹象,上可承接旧石器阶段,下则达于早期新石器,说明这儿人口较多,对生产的需求较迫切,这是导致农业出现的重要因素。从自然条件看,西亚地区从公元前 10000 年开始也逐渐转向温和潮湿,在地中海东岸和波斯湾沿岸,小片草地和栎树林渐向四周扩展,内陆丘陵地植被亦渐增多,其中最有生命力的一种植物,就是日后成为农作物的大麦、小麦的野生祖本的大籽草,它成片生长,春季成熟,穗实易于脱落采集,在农业业萌芽阶段对人类最有吸引力,经栽培成作物后也是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粮食作物。此外,西亚广大地区的丘陵和山麓地带还繁生着野生的山羊、绵羊、猪、狗和赤鹿、瞪羚等兽类,它们适于食用又较易捕捉,其中大多数经驯养就变为最重要的家畜,所以这儿的天时地利都为农牧业的产生提供了较好条件。当然,农牧业的产生主要取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内因,而当时西亚各地已发展到的原始新石器阶段就是这一内因。

像纳吐夫文化这样的原始新石器文化的遗址还多为山

洞,说明其时尚有旧石器穴居野处的余风,但有些较发达的遗址已在平川草地上建造季节性的甚至永久性的房屋住所,说明农业也已在萌芽之中。例如扎维凯米——沙尼达尔就是这样一个穴居和村舍两者皆有的遗址,沙尼达尔是山洞,扎维凯米则是平川上的夏季住所,也有人称之为最早的一个村落,两地相距约 8 华里,当时人夏季劳动于平川,秋冬则移居洞穴。夏季的劳动,除狩猎采集而外,也开始较集中地收获野生的大麦、小麦,因此这时的石制工具中已有石镰、长柄锯齿镰(以细石器为齿嵌于骨制长柄上)、磨盘、臼、杵等农具。这正是农业萌芽阶段的特征,说明当时人类已开始集中收割一定品种的野生作物,但是只有收而无种,因此农具都是收割研磨用具。与此相类似,当时人的狩猎活动已开始集中于一定品种的野生动物,意味着畜牧的萌芽,例如纳吐夫文化中的贝哈遗址发现的野山羊骨占全部兽骨的 76%,不仅说明当时狩猎已有选择地进行,而且盯住了一些容易驯服的品种,随着对这些特定品种的接触、了解以及捕获的增多(尤其是幼兽捕获的增多),就为下一步的驯养创造了条件。总的说来,即使是萌芽状态的农牧业,它作为人类衣食之源的重要性也日渐显露,因此原始新石器文化的发展趋势是村落定居越来越明显,像马拉哈这类较发达的典型已有圆形房屋的石造墙基,迈出了定居生活的决定性的一步。从此以后,人类便开始有用自己双手建造的家宅了。

从萌芽的农牧业发展为成熟的农牧业,主要看以下三点 (一)农作过程已包括从种到收的全部阶段,而且耕种、

管理越来越重要,而畜牧也以家生驯养为主(二)农作物和家畜已形成人工培育的品种,它们可从形态学和解剖学上予以明确划分;(三)农作物和家畜都已散布于超出其野生祖本生存区域以外的地区。能达到这三点,自然是人类生产技术有了很大提高的结果,有了它们,在生产领域内“人定胜天”的威力就能逐渐发挥起来了。从考古遗物上看,西亚早期新石器文化遗址中已明显地反映了这三方面的情况。这些遗址中著名的有伊拉克的耶莫、巴勒斯坦的耶利哥、叙利亚的木勒贝特、土耳其的恰约尼、伊朗的甘吉·达勒和阿里·库什。例如,耶利哥(亦译杰利科)已发现约在公元前8000年的小麦和大麦的种子,并已具有人工栽培的形态,此外,还发现了小扁豆、无花果等作物,阿里·库什也大约同时出现了上述品种的大小麦和豆类。人工驯养家畜的最好物证则来自甘吉·达勒,这个村落遗址的一块泥砖上留下了山羊的蹄印,因为如果不是家养山羊并且养得较多,是不会在制砖场地让羊蹄踩在泥坯上的,与此相伴,这个遗址的兽骨中山羊竟占90%,可见畜牧业已经形成,它的年代也在公元前8000年左右。下一步就可见到农业或畜牧业都较发达的村落,例如土耳其的恰约尼,它在公元前7500年左右已有小麦、大麦、豌豆、扁豆等的栽培,绵羊、山羊和猪亦成为家畜。恰约尼遗址还发现了数枚用天然铜打制的铜针、方形的扩孔锥、钻孔珠等,可见铜器的使用尽管稀罕却已开始。再下一步,像耶利哥和耶莫这些著名遗址经长期发展已变成比较繁荣、宏伟的居民点。耶利哥在公元前7300年左右已是一个占地5公顷、居民约2000人的大村落,它

最突出的建筑是一座圆形石塔，直径 10 米，高达 8.5 米，内部实心但有石梯达到塔顶，全村四周还有厚达 3 米、高约 4 米的石墙，石塔在墙内，墙外则有宽 8.5 米，深达 2 米的壕沟，可见其防御措施的完备坚固。有能力建造如此坚固的防御工程，可见其农业生产和社会组织都达到一定的高度，将从早期的新石器时代走向繁荣期的新石器时代。

在繁荣期的新石器时代，农业革命引发的一系列社会变化归结到一点，就是原始社会的结合和古代文明的诞生。以西亚地区为例，繁荣期的新石器时代约从公元前 6000 年到前 3500 年，此后就是西亚最早的文明——苏美尔文明诞生之时。繁荣期的新石器时代的农业村落有些最发达的已接近于形成一个市镇或城市，不过这些最早市镇还比较孤单稀少，未能成气候，因此又要酝酿变动一段时间，在条件更好的一些地区（往往是大河流域）有许多市镇成片出现的时候，才能产生真正的文明，例如苏美尔文明出现的时候，就同时有数十个大大小小的苏美尔城市，埃及也是这样。要达到这样的规划，没有较长时期的酝酿是不可能的。个别孤立的繁荣期新石器时代的村镇，有时会发展得很突出，但尚不足以直接走向文明，就是这个原故。这方面最著名的例子是土耳其的恰塔尔·休于，它在公元前 6000—5500 年间是西亚地区最大的居民点，甚至可说是世界最早的一个城镇。它有居民五六千人，占地 32 英亩，已开始采矿炼铜，商业贸易可远达千里（它出产的黑曜石已在伊拉克、叙利亚等地发现），农业已初步利用水利灌溉。如此等等，说明它已距文明的门槛不远。但孤处土耳其中部山区的恰塔

尔·休于仍有孤掌难鸣之叹，它在公元前 5400 年以后竟盛极而衰，因此最早的古代文明并没有在土耳其出现。但恰塔尔·休于这个例子也表明农业革命的机制一旦发动，人类社会便一步一步地向文明靠近。

农业革命又是怎样地导致文明的诞生呢？总的说来，农业革命是使人类社会的生产力和生产活动发生了带有根本意义的变化，因为以前的采集狩猎经济是靠获取天然物产为生，受自然条件限制很大，现在人类是以自己生产的农牧产品作衣食之源，人类开始从依靠自然转向改变自然进而征服自然。农牧业使人类的食物产量提高、品种优化、贮藏方便，人类现在可以通过自己的劳动获得稳定的食物供应，人口增长较快，人类也分布全球。除了食这个主要问题外，农牧业为衣、住、行等人类基本生活方面提供的改进和保证也是巨大的。因此，总的说来农业革命不仅使人类生活水平大有提高，也使人类与自然斗争有了更多的手段。同时，从系统论的角度看，农牧业的出现又进一步带动了科学技术和知识文化领域其他许多方面的发展，彼此促进，造成一个良性循环。例如务农须知天时节令，历法天文随之发展起来，植物学、动物学、生理学的知识随之增长，数学、医学、药理学和地理学的知识也逐渐有所积累。农牧业还推动了制陶、纺织、航海和轮车等重大技术发明，并推动金属冶炼和工艺制造业的发展，因此也有助于物理化学、地质矿物等科学知识的萌芽。这一切都是人类文化提高到文明这一更高阶段必不可少的物质与精神基础。但是，比这一切更重要的是，农业革命还在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方面带来了一系列

深刻的变化——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出现了社会大分工：首先是农业和畜牧业的分工，其次是手工业从农牧业中分离出来，最后则是商业的出现。分工带来交换，生产提高使剥削成为可能，于是私有制发展起来，出现了奴隶和贫富分化，在没有阶级的原始社会中终于逐渐形成了萌芽状态的阶级 奴隶主和奴隶 贵族与平民 富人与穷人。这时就必然要用国家来代替原来的部落和氏族组织。要进行政治统治、进行各种经济和文化活动还必须借助更有效的信息工具，于是文字发明出来，文明就名副其实地诞生了。现在已经有充分的资料证明：人类文明的起源毫无例外地必须以农业革命为基础。在世界历史上，绝没有不经过新石器时代的农业革命就建立国家创造文明之例。因此，没有农业革命就不会有人类文明，正是第一次浪潮为我们带来了文明的曙光，而农业也是一切古代文明社会的经济基础和物质基础。

二、繁花似锦的文明曙光

农业革命以后，文明的曙光必然在地球上闪现。但是，到底哪个地方最早出现文明，世界上究竟有哪几个地方独立地创造了自己的文明，仍是历史学界和考古学界在不断深入研究的问题。一般而言，东西方各族人民的古代史籍和民间传说都不乏本族本国远古文明起源的记述，有的和神话混杂，有的属传闻性质，只有经过考古资料的证实和科学的考证，才能真正解决各古代文明起源的问题。自 19 世纪以来世界史学界普遍承认两河流域、埃及、中国和印度是历

史最为悠久的文明古国，但它们首先在何时何地创造自己的文明，现存的史料仍难以说清楚，亟须考古发掘予以进一步澄清和证实。另一方面，20 世纪以来丰富的考古发现在证实四大文明古国名不虚传的同时，也发现了这些地区更为远古的考古文化；积累了更为丰富的有关文明起源的材料，对人类历史的规律性发展有了更深入的认识——例如前一节提到的对农业革命的发现与研究。再者，如前所述，新的、充分的考古材料还证明文明的起源地不仅限于四大文明古国，欧洲和美洲也有创建古代文明的荣誉。这一切都向考古学界和古代史学界提出了一个值得深入讨论的问题：如何从考古遗址和遗物上找出能够判断古代文明诞生、原始社会结束的标志？如果能确定几个看得见、摸得着的实物标志，有关问题就比较容易解决了。

经过国际学术界热烈的讨论，目前比较一致的看法是：不应孤立地把某一标志当作绝对的标准，而应考虑到各族各地的具体特征和古物保存的不完整性，寻求较多几个有内部联系的标志，只要其中有两三个同时出现或存在便可作出正确判断。因此学术界认为荷兰学者克鲁克荷恩在 1958 年提出的方法至今仍比较切实可行。他提出了三个标志文明诞生的可用遗址、遗物判定的基本条件，只要能满足其中两条，便可表明该地区该时期已进入文明。这三个条件是：

第一，在一定区域的聚落（居民点）中已有好几个互相联系的、人口至少在 5000 以上的城镇、集镇或城市；

第二，已有独立创造的文字体系或借用部分外族文字

而形成自己的文字；

第三，已有纪念性建筑遗迹和进行仪典活动的中心场所，或已有宫殿、城墙、监牢之类标志国家统治的建筑遗迹。

这三个条件不仅都可用实物为证，而且反映了具有关键意义的社会发展情况。例如第一条就直接与生产规模、经济水平有关，它指明了文明能够出现的经济与物质基础。古代文明是第一个阶级社会，也就是第一个剥削社会。在古代条件下，要保证一个人成为统治阶级过不劳而获的生活，或者保证一个人脱产而从事脑力劳动，从社会整体需要估计那就至少要用三四十个甚至五六十个人的劳动来供养他一个人，也就是说，必须集中剥削数十人的劳动才能保证一个统治阶级的人员存在。当组成国家时，即使是萌芽阶段的奴隶制小国，这类统治阶级人员以及为他们服务的军政、宗教、文化人员至少数以千计，那么被统治、剥削的人口（包括奴隶、农民、手工业者的劳动人民是其主体），至少应在数万以上，而与第一个条件所指的几个 5000 以上人口的市镇及其联系的人口总量大致与之相当。而且，有了好几个这类彼此联系的城镇，不仅说明农工商业、私有制已比较发展，社会大分工已经完成，而且城镇在政治和经济上已控制着周围的农村，国家中央机构所在的首要城镇的地位还会比其他城镇高一些，形成了小国的首邑与中心。从这些情况看，城镇和城市的成片出现跟文明有不解之缘，所以过去有人把它称之为城市革命，有了城市便会有文明。但从实物上看，城镇遗址若具有文明的特征，则其遗物自必包含以下两个基本物证：其一也就是上述的第二个基本条件——文字，

因为有文字就表明此时已有了较原始社会更为复杂的经济统计、行政管理、文化活动与信息交流,文字正是为这些新的、具有文明意义的、社会职能服务的、最重要最有代表性的工具,这些社会职能从一般的考古遗物上往往反映得不很充分,有了文字则能说明一切。所以也有人说有了文字便有了文明。另一类物证就是上述的第三个基本条件,它表明已存在一区一国的集中管理机构和统治阶级,例如豪华的宫室反映了国王、贵族、祭司等类统治者的存在,高大宏伟的神庙、仪典中心、城防工程以及碉堡监狱等等则是统治者镇压人民的象征。因此,上述三个基本条件都是有紧密内在联系的物证,它们能起‘一叶知秋’的标志作用,而且往往有其一必有其二,有其二必有其三。我们在学术研究中提出三者有其二便可判定,也是估计到了各族各地发展道路的具体性和特殊性,此外还有古物保存很难齐全等等情况。

根据以上所说的判断方法,我们便会看到人类文明的曙光确实像繁花似锦般在古代初期的两三千年间在亚、非、欧、美几大洲逐渐出现。西亚的两河流域和北非埃及最早,它们几乎同时在公元前 3500 年左右脱离原始社会进入文明时代,中国、印度和欧洲的克里特则较晚一些,大约在公元前 2500—2000 年间进入文明时代。美洲的墨西哥、马雅和安第斯山区则更晚一些,约在公元前 1000 年左右进入文明时代。这些古代文明都是当地民族独立的创造,它们都可称为人类文明的先驱和摇篮,它们取得的辉煌成就已成为世界各族人民共同享有的人类文明的优秀遗产,永远值得我们感激和纪念。

三、古代文明的发展规律

人类在五千多年前开始进入文明时代，到今天当然经历了各个阶段和时代，这种情况在历史科学中称之为历史分期。世界各民族都常用的一种分期法是按一个国家或一个王朝的兴亡分期，如中国的唐、宋、元、明、清之类，但国家或朝代的更替虽能标志一族一地历史演进的先后次序，却过于频繁琐细，在许多情况下，改朝换代并不意味着社会结构的根本变化，所以人们又往往用一种更大的阶段划分人类文明的历史。从 16 世纪以来，比较流行的分法是把人类文明从古到今分为古代、中世纪、近代三个阶段，可分别称之为古代文明、中世纪文明和近代文明，后来人们对社会发展的阶段性有所认识，又分别称之为古代社会、中世纪社会和近代社会。但古代社会是什么性质的社会？中世纪社会又是什么社会？说起来就比较随便和混乱。直到 19 世纪历史学、社会学、经济学等等学科深入发展以后，人们才能比较科学地回答这类问题，而它们的真正解决是在马克思主义形成之后。马克思主义认为，在进入文明之前的人类社会是原始社会，进入文明之后人类依次经历了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几个大的阶段，进行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国家，例如我们中国，则开始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因此，古代社会就是奴隶社会，中世纪社会就是封建社会，近代社会则是资本主义社会。人类社会的阶段性发展是由社会生产力由低到高的规律性发展决定的，它的次序不可能

出现颠倒和错乱。例如，古代社会的奴隶制生产关系在文明社会中是最低级、最落后的，它和人类进入文明初期的低下生产力相适应，那时最初还属于石器和金属器并用的时代，然后有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主要靠手工体力劳动，所以采用奴隶制这种野蛮残酷的剥削方式才能为统治阶级带来最大利益，而奴隶制的不断发展就是奴隶社会的一个最显著的特征。依此类推，与封建农奴制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便是比较发展的铁器时代的生产力，工具使用较前进步、精细，于是野蛮的奴隶制生产关系便不能奏效了，统治者剥削农民和农奴要比剥削奴隶有更大好处，奴隶制就不得不退出历史舞台，而中世纪的社会便是封建社会。根据这个道理，我们可以说古代文明的发展规律中最基本的一条就是它是属于人类社会中的奴隶社会阶段。

奴隶社会对比于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当然是野蛮落后的。可是，作为第一个文明社会——古代文明的社会，它比起原始社会却有其进步、必然取而代之的一面。大家知道，原始社会的生产关系是原始公社制，那里既无压迫也无剥削，以充满残酷剥削压迫的奴隶制取代平等民主的原始公社制，表面上看来似乎于理不公，实际上却正是历史辩证发展的必然要求。在当时生产力条件下，只有通过奴隶制之类野蛮的阶级压迫方式，才能实现一种更重要的社会分工：把奴隶和其他劳动人民生产的剩余产品集中起来，供一部分脱离生产的人员从事文明创造所必需的其他活动，只有这样，国家才能形成，才能进一步为经济的提高、交换的扩大、科技的改进、文化艺术的发展开辟更广阔的前景。

只有着眼于这一点，我们才能充分认识奴隶社会与古代文明之间的历史联系，同时充分估计奴隶社会条件下古代文明创造的重大历史意义。在这里，我们也看到了另一个重要问题：虽然古代文明社会的统治阶级是奴隶主阶级，古代文明打上了这个阶级的烙印，但创造文化成果的却主要不是他们，而是被他们压迫剥削的奴隶群众和广大的劳动人民。就这一点说，古代文明实际上是古代奴隶和劳动大众血汗的结晶，他们在那么残酷、艰苦的条件下取得的成果岂不是更值得我们钦佩和敬重么？

除了奴隶社会这个根本特点外，古代文明的发展规律还可从国家形态的演变看出它本身从萌芽、发展到繁荣的阶段。由于各个古代文明都有自己的显著特征，而有关它们的史料又很不完全（有些古代文明完全是靠考古发掘才为我们所知，文献史料更缺），这就使人对它们的发展情况难以作规律性的比较，研究者各执一词，似乎看不到它们之间有什么共同的规律。西方学术界中受到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观点影响的人还认为古代文明中只有希腊罗马才是发达的典型，其他的东方文明和美洲古文明都是不成熟的或畸形的，更暴露了他们对历史的无知。因此，对古代文明本身由低到高的发展给予规律性的说明，找出能表现这些规律性发展的重要标志，对于研究古代文明说来是很有必要的。古代文明国家形态的发展，即由小国到大国到帝国的规律，就是这方面的一个方便而适用的标志。小国有点像前面所说的文明出现第一个条件所指的那些好几个城镇组成的政治实体，我们也可以称之为奴隶制小国，往往只有日后国家

行政规划中的一州一县的大小，它在原始社会解体时必然是多个(10余个或数十个)像满天星星般纷纷出现,这是国家的萌芽阶段,也是古代文明起源的最初阶段。然后各小国之间经过吞并、征服或者联合、结盟而形成一个大国,在古代条件下,这种大国当然是国王统治的,但它结合各小国时往往也有一地域或地区之间经济联系的基础和民族、语言、文化接近的历史背景,我们也可以称之为该地区该民族的合并与统一,即各小国统一为一个大王国。如果说小国是古代文明的萌芽阶段,大国则是其发展阶段。再下一步,这一地区的大国和另一地区的大国再起冲突、吞并或征服,便出现了广土众民的帝国,广土是指它除本国领土外还征服了别国的领土,众民则是指它除统治本民族外还统治别的民族,这就是帝国的主要标志。到出现帝国的时候,这一地区的古代文明必已经历千百年的发展,帝国的建立也就代表着这一古代文明的繁荣阶段。当然,帝国也是有兴衰起伏的,往往此一帝国灭,另一个帝国兴起,但是,就其标志古代文明发展的阶段意义说,只要此地此文明有帝国出现,那第一个帝国就是这个古代文明发展到繁荣阶段的表征,以后的诸帝国的兴衰与王朝的更替不过是这一阶段的继续,直至生产力的提高引起了古代文明奴隶社会的总危机,奴隶社会才进入衰亡阶段而被封建社会取而代之。

我们上面说的这个从小国到大国再到帝国的发展历程为什么就是古代文明从萌芽到发展到繁荣三大阶段的规律性的表征呢?这主要是根据古代文明属于奴隶社会这个根本特点。因为它是奴隶社会,是第一个阶级社会,它的前身

是无阶级的原始社会，所以它的国家的产生，也就是国家形态的发展过程，必然是由小国到大国再到帝国。各地完成这一过程可能有快有慢并有自己的特点，这一过程本身的规律性却是不会改变、不会颠倒的，例如不可能在原始社会结束时就出现一个大帝国。也正因为它是由前一社会是原始社会决定，这个规律对封建社会的中世纪或资本主义社会的近代就不适用了，我们知道，各个国家进入封建社会或近代社会时便会依其具体历史情况可能是小国、大国或者帝国，因为它的前一社会已是阶级社会。依此类推，我们这里所说的小国——大国——帝国的演进代表该社会由萌芽到发展到繁荣的规律也就不适用了，所以我们说它只能用于古代文明的奴隶社会阶段。从更深的原因说，小国所以是奴隶制国家的萌芽阶段，而大国、帝国是奴隶制国家发展与繁荣的阶段，也和奴隶制本身的特点有关。大家知道，奴隶制这种最野蛮最残暴的生产关系完全依靠统治阶级的直接暴力才能强迫奴隶从事劳动，奴隶主的国家机器就是这种直接暴力最主要最集中的表现。因此，奴隶制经济的繁荣、奴隶制文明的繁荣与其国家规模的扩大有密切的内在联系，国家越强越大，掠夺的奴隶就越多，也才能对千千万万的奴隶进行大规模的血腥镇压。如果说大国对于小国、帝国对于大国分别代表着国家规模的更高一级的发展，那么，它们不也就同时意味着奴隶制社会的更进一步发展么？实际上，各古代文明进入帝国阶段，也都是掠夺奴隶最多、剥削奴隶最甚的阶段。例如埃及在新王国的帝国时期，阿蒙荷特甫二世即位第九年远征叙利亚之役，虏掠奴隶^{10.11}28万人，其